
傳媒教育、公共空間與公民批判能力： 香港傳媒教育的理想與實踐

李月蓮

摘要

香港傳媒教育在1997年之後迅速發展，主要是受到回歸後傳媒環境惡化及公共空間破損的刺激。傳媒教育倡議者建議，採納「社會參與模式」來推動傳媒教育運動，培養具批判能力的公民，改善傳媒環境。這篇文章探討傳媒教育、具批判能力的公民和公共空間之間的關係，審視「社會參與模式」的實踐情況。研究發現，香港傳媒教育在訓練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方面取得認同。但由於「非政治化」的教育環境，令傳媒教育的課程也變得非政治化，所以在鼓勵社會參與方面，只局限於社會文化領域，不涉政治範疇，故此未能全面協助振興公共空間。

關鍵詞：傳媒教育、公共空間、具批判能力的公民、社會參與模式

李月蓮，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副教授，並任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副主席。研究興趣包括傳媒教育、新聞素養、免費報紙、網絡新聞、新媒體與知識社會。
電郵：alicelee@hkbu.edu.hk
網站：「香港傳媒教育計劃」www.hkbu.edu.hk/~alicelee/media-education

Media Education, Critical Citizenship and Public Sphere: The Ideal and Practice of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lice Y. L. LEE

Abstract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was only launched after 1997. Its rapid growth was largely due to the worsening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and deteriorating of the public sphere after the handover. Media educationists propose to adopt the “social participatory model” to promote media education, to nurture citizen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o improve the media environment, and to boost the public sphe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edia education, public sphere and critical citizenship. It also examines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ory model.” Findings show that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s successful in training citizens’ critical mindedness. But due to the apolitical nature of Hong Kong’s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dia education curriculum tends to be apolitical as well. As a result, media education can only limit its scope in the socio-cultural arena in terms of pro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aspect is often neglected. This is why media education cannot promote the public sphere in Hong Kong to the fullest extent.

Keywords: media education, public sphere, critical citizenship, social participatory model

香港的傳媒教育在1980年代已經醞釀，但真正的發展還是1990年代末香港回歸中國以後的事。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經濟掛帥，不大關心自己的文化，加上九七問題成為社會的焦點，他們無暇理會傳媒生態。1997年之後，雖然新聞自由依然維持高水平，但傳媒的自我審查令它的公信力下降，市場導向新聞令傳媒環境劣質化，引起社會關注。有倡議者提出以「社會參與模式」(social participatory model)來推行傳媒教育，重建健康公共空間(Lee, 2000a)。

這篇文章探討傳媒教育(media education)、具批判能力的公民(critical citizenship)及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的關係。它回顧回歸十年來傳媒教育在香港的發展，分析「社會參與模式」的落實情況，探討傳媒教育在培養具有批判能力和社會參與意識的公民所遇到的挑戰，並討論傳媒教育理想和實踐之間的落差。

這個研究的分析，是基於深入訪談、問卷調查和個案研究搜集回來的資料。接受深入訪談的人士包括在香港推動傳媒教育的主要機構成員、教師和教育統籌局官員(見附錄一的訪問名單)。訪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於2000年至2001年間進行，接受訪問的人士共有21位。第二階段於2007年進行，訪問了11人。研究的分析也是基於兩次傳媒教育問卷調查。第一次在2001年3至5月進行，對象包括全港中學、青少年服務中心、社區中心及參與傳媒教育的相關組織。調查向632間機構發出問卷，了解這些機構推動傳媒教育的情況。第二次的調查在2005年4月至10月舉行，對象是中學教師，目的是研究他們把傳媒教育引進學校的意見，收回的問卷共447份。此外，資料搜集還包括三個傳媒計劃個案分析，它們分別是靈風中學「跨進新紀元傳媒教育」計劃、突破青年機構「傳媒及資訊意識教育」計劃和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傳媒評論年」計劃。

傳媒教育、具批判能力的公民與公共空間

傳媒教育在世界各地發展了幾十年，但重點大多數落在個人身上，旨在引發個人發展良好的傳媒品味和精明的傳媒消費意識。不過也有一些傳媒教育工作者建議用宏觀的角度看傳媒教育，認為傳媒教育在社會層面可以為建設一個民主社會作出貢獻(Lee, 1996; Schwach, White, &

Reilly, 1992)。例如在南非，推廣傳媒教育的目標就是建設一個民主的公民社會 (Court & Criticos, 1998)。

過去30年，推行傳媒教育最流行的做法包括「防疫取向」(inoculation approach)、「創意媒體取向」(creative media approach)和「批判取向」(critical approach) (Buckingham, 2003)。防疫取向的目標是幫助年青人抵抗傳媒的「病毒」，它頗受家長及教師歡迎，但這個取向建基於悲觀的「科技宿命論」(Ellul, 1964)，把傳媒視為社會的病源，值得商榷。

創意媒體取向則透過傳媒製作進行傳媒教育。它由「科技賦權論」(Buckingham, 2000)衍生出來。新科技打破了主流傳媒的壟斷，媒體變成開放式，傳媒與受眾雙向互動，受眾掌握選擇權，他們在一種賦權的意識下享受傳媒創作的樂趣。但這個模式並非完全強調創作嬉戲，它引導學員在進行傳媒製作時，反思創作的過程，了解「客觀現實」如何被建構成「傳媒現實」。它又鼓勵學生運用媒體，主動探索世界及獨立發聲，是一個以學生經驗出發的教育取向，比較重視個人層面的探索。

批判取向教導年青人解構傳媒訊息背後的意識形態，培養他們獨立的批判能力。批判取向建基於「政經決定論」(Masterman, 1985)，認為傳媒被有財有勢的統治階層操控，成為複製主流意識及維持社會現狀的工具，所以批判取向呼籲年青人不要被傳媒牽着鼻子走，避免用當權者的觀點看問題，或用商品主義的眼光看世界。批判取向的優點在於強調培養具識辨能力的受眾，但它的缺點是把傳媒教育局限在「自求多福」的個人層面，沒有重視傳媒教育的社會潛能。

香港一些傳媒教育工作者倡議，採用另一個傳媒教育取向，即「社會參與模式」。這個模式的理論基礎是「科技社會建構論」(Williams, 1962)，認為科技應用是由人作決定的。傳媒受社會文化環境塑造，所以傳媒的影響是可以隨著社會進步而逆轉，公民仍有機會參與建設及改變傳媒的體制。故此，從這個理念發展出來的傳媒教育，不僅著意培訓大眾解讀傳媒的能力，還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運用各種媒體表達意見，及發揮監察傳媒的力量 (Lee, 1996)。所以傳媒教育除了訓練精明的傳媒消費者和靈活的媒體創作者之外，還致力培養有社會責任感及具備獨立批判能力的公民。

這個模式是一個融合模式，將現時流行的傳媒教育取向綜合起來。

特別吸納批判取向及創意媒體取向的長處，將批判思維及創意表達跟社會參與結合一起，並強調意見表達和傳媒監察。它的課程鼓勵大眾市民尤其是年青人認識、分析、善用和影響傳媒。這個模式的優點是重視發展及改良傳媒體制，呼籲以社會行動進行傳媒改革。

「社會參與模式」傳媒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能為建設民主社會作出貢獻。要達至這個目標，就牽涉到公民團體及公共空間這些概念。有關大眾傳媒、公民團體和公共空間之間的討論，在學術界一直以來都十分熾熱。哈巴馬斯 (Habermas, 1989) 設想的公共空間，是公民就大家關心的事情，自由交換消息和意見而形成民意的場地。他指出公民有集會討論公共事務的權利。哈巴馬斯的理想公共空間強調公民參與要公平和公開，流通的資訊要準確，討論要理性及具批判性，還要不受政治及市場力量的操控。公民的批判性互動產生民意以後，可以影響政府的施政和社會的發展 (Dahlgren, 1995)。所以獨立及健康的公共空間，是民主社會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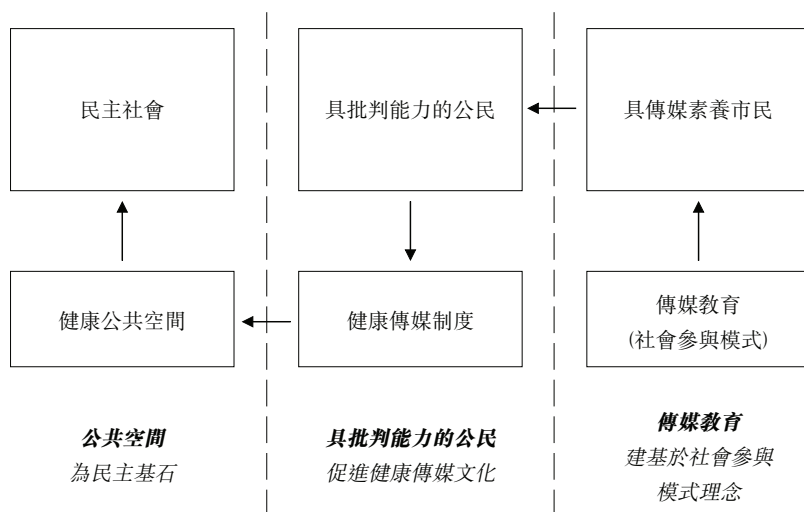
在二十及廿一世紀，市民大眾無可能全部親身集會議論公共事務，大眾傳媒於是成為主要的公共空間。所以趙爾俊 (Dahlgren, 1995) 指出，在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概念是指大眾傳媒 (尤其是新聞傳媒) 如何能協助公民了解世情、討論時事及謀求解決方案。近年公共空間的表現已被視為社會民主情況的一面鏡子，如要促進民主，大眾傳媒必須開放及公正，而且要肩負社會責任，向市民準確全面地提供資訊、協助他們理性地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及鼓勵他們獨立投票。

很可惜，現代社會的大眾傳媒很多有負所託，導致公共空間淪落。哈巴馬斯 (Habermas, 1989) 也悲嘆民意不是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廣告公關、政治化妝師及很多社會利益團體經營出來的產物。他指出，傳媒商品化、傳媒壟斷、傳媒專業操守水平下降和政府的干預，都是導致公共空間不振的原因 (Boyd-Barrett, 1995)。近年捍衛公共空間的呼聲愈來愈高，趙爾俊 (Dahlgren, 1991) 建議發展「具批判能力的公民」(critical citizenship) 以振興公共空間。具批判能力的公民是指具有批判能力及社會責任感的公民集體。公民的概念和公共空間有關，是因為公共空間是由公民的社會文化互動構成。而公民的概念包括了保障個人言論自由、參與政治及運用政治權力的權利 (Dahlgren, 1995)。一個民主社會要求它

的公民懂得自己的權利，並且有意願履行應盡的義務。如果公民權責分明，他們又具備批判思維能力，他們就可以在公共空間裏進行高質素的互動。

「社會參與模式」傳媒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培養對大眾傳媒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對於振興公共空間大有幫助(見圖一)。一位公民如果具備高程度的傳媒素養，表示他有以下的能力：一、認識傳媒，即了解傳媒的功能、對傳媒的影響力有警覺性和對傳媒有鑑賞力；二、懂得分析傳媒訊息；三、善用傳媒，即懂得媒體製作及運用媒體表達意見，又能透過傳媒求取新知識；四、監察及影響傳媒制度的發展。如果社會的成員普遍具備以上的素養，他們不僅不會被傳媒誤導，而且會有能力就傳媒議題及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並且具備敦促傳媒機構改革的識見，而健全的傳媒體制，正是健全公共空間的先決條件。若有這樣一羣公民，那麼社會的傳媒公共空間就有更大機會保持理性清明，民主健康的社會就可以建立。反之，若公民的傳媒素養低，傳媒公共空間烏煙瘴氣，民主體制就受到危害，良好的社會文化風氣也難以樹立。故此，培養兼具傳媒素養及社會參與意識的公民，至為重要。

圖一 傳媒教育建設民主社會的過程



回歸後的香港公共空間

1997年香港的主權由英國移交回中國，開展了香港的「後殖民地時代」。「後殖民」這個概念有批判意義，它暗示殖民地統治的結束未必帶來美麗新世界 (Tao, 2000)。香港步入後殖民地時代之後，也非一帆風順。1997年以後，香港出現「後殖民地失範症候群」(post colonial syndrome of anomie)：假自治夾雜著留戀殖民地情懷，憂慮中國政治干擾導致身份認同迷失，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棘手社會問題又牽絆了經濟繁榮發展的渴求。

香港人當然想脫離這種失範狀態。他們大多有一個願景，就是香港社會朝着政治民主開放、經濟自由創富及文化多元發展的路向走。要達到這個理想，香港的傳媒需要做好擔當「公共空間」的角色，讓市民大眾就實踐一國兩制理性地交換意見，並監督制衡特區政府的施政。但很可惜的是，香港的傳媒公共空間在回歸後未能進一步發展，反而有質素下滑的情況。公共空間的破壞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政權移交中國後引致的傳媒自我審查，還有新聞的非政治化；二、「市場導向新聞」的流行造成的傳媒環境劣質化 (Lee, 2000b)。

回歸之後香港依然享有新聞自由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1999)，但新聞界的自我審查愈來愈明顯，並危害新聞媒體的可信度。香港中文大學一項對記者的調查顯示，在2001年認為新聞界存在自我審查而情況嚴重的佔14.0%，而認為不嚴重的佔61.2%。到了2006年認為新聞界存在自我審查而情況嚴重的上升至29.2%，認為不嚴重的也佔51.9%。而新聞傳媒的可信度由1996年的5.96 (10為滿分) 下降至2006年的5.81 (So & Chan, 2007)。韋斯 (Vines, 1999) 解釋，近年香港的媒體擁有權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商界大亨手中，他們只視傳媒為集團生意的一部分，當他們積極拓展中國業務的時候，並不想開罪中國政府，於是他們旗下的傳媒，會迴避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南華早報》前副總編輯林和立被迫離職，正因為他的老闆不滿意他的文章批評中國政府 (Arvidson, 2000)。

除了自我審查外，回歸以後另一個引人關注的傳媒趨勢是新聞的非政治化。在1984至1997年期間，香港傳媒提供大量政治新聞，很多報紙還另闢「政情版」，新聞工作者也出現政治記者這個類別。但回歸以後，

本港傳媒把報道的重點轉至非政治議題，大大減少了政治新聞報道。香港步入後殖民社會之後，正面對政治權力重組及民主政制發展等重要政治課題，其實甚有詳細報道、分析及討論的價值。而且新聞有「議題設定」的功能 (McCombs & Shaw, 1972)，如果政治新聞及社會政策新聞不被列為重要的新聞議題，記者不主動發掘報道這方面的消息，或是以「政治八卦」的娛樂手法來包裝政治新聞，香港市民接觸和思考這些問題的機會也會相應減少。但香港傳媒在回歸以後，報道突發新聞、社會民生及娛樂新聞往往比政策事務還要多。有議員指責這是董建華政府有意將傳媒的注意力由政治議題轉移至民生議題 (劉慧卿，個人訪談，2000)。但新聞界人士認為政治新聞減少主要是因為回歸後本地議會及政黨引發不到有重要性的新聞，而傳媒又集中報道董建華政府的種種社會民生政策失誤，所以注意力轉到社會及民生方面，而最重要的，是政治新聞不可以刺激銷路，所以報道量就減少。新聞工作者又同意回歸後公共空間遭受蠶食，傳媒的政治立場多樣性減少，再無以往左、中、右的聲音。近年電視台的數目增加，又多了120多萬份免費報紙在市面流通，但這不代表香港公民社會的聲音多了和意見更多元化 (馮偉光，個人訪談，2007)。

正當香港的傳媒轉趨非政治化的時候，市場導向新聞在香港大行其道。市場導向新聞的製作建基於讀者的喜好多於專業操守 (So, 1997)。香港暢銷報紙《蘋果日報》創辦於1995年，它的出現標誌着「完全市場導向新聞」的流行，其他報章隨後也相繼「蘋果化」。在報業市場上，銷量最高的三份市場導向大眾化報紙，吸引了近七成的讀者 (AC Nielsen, 2001)。這些報章報道聳動的犯罪新聞和社會新聞多於政治新聞，它們被指忽視社會責任，令煽色腥的資訊泛濫 (So, 1997; Vines, 1999)。市場導向新聞普及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1997年及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經濟打擊很大，令報業廣告收入嚴重收縮，報業的割喉式減價戰令競爭更大，但本地報章並沒有製作更高質素的內容去吸引讀者，反而用煽情的手法去製造新聞，以爭取觀眾讀者，又以狗仔隊跟蹤新聞人物，侵犯私穩 (Wong, 1999)。消費資訊充斥著新聞版面，令廣告與新聞的界限模糊 (Leung, 2000)。

哈巴馬斯曾指責大眾媒體的商品化是導致公共空間腐敗的主要因素。在香港，市場導向新聞也被指嚴重污染了香港的傳媒環境，令公共

空間淪落。傳媒的惡劣表現引起公眾的廣泛不滿，就連香港六大宗教領袖也打破開埠以來的傳統，首次聯合譴責傳媒，社會各界都覺得有約束及改革傳媒的需要。其實如何監管傳媒，中外國家不外乎考慮三個辦法，一是立法監管，二是業界自律，三是進行傳媒教育。由於第一個辦法恐怕會危及言論自由，第二個辦法的成效不高，而且成立自律監察組織只是治標不治本之道，於是第三個辦法即透過傳媒教育監察傳媒，或者抗衡傳媒的負面影響，便吸引了公眾的注意。

不少社會團體及教育團體看見青少年受傳媒的影響日深，曾要求政府監管不負責任的傳媒，不過政府並沒有具體對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相信是香港處於「一國兩制」的敏感歷史階段，若果政府強力約束傳媒，恐怕招來箝制新聞自由的批評（蔡志森，個人訪談，2007）。另一方面，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處於弱勢，傳媒相對強勢，於是出現「小政府、大傳媒」的情況（So & Lee, 2006）。特區政府既無政治決心又沒有能力整治市場導向的傳媒，於是香港傳媒的商業化表現變本加厲（馮偉光，個人訪談，2007）。

1997年以後的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政治新聞減少、言論空間收窄、不良資訊泛濫、傳媒商品化風氣盛行，均影響到公共空間裏資訊的自由流通及意見的理性交流。主權回歸中國，香港人經歷了政治過渡的陣痛，意識到社會福祉需要自己爭取。一些不滿意傳媒表現的人士，覺得要採取積極行動以改善傳媒，故此認為推廣傳媒教育實有急切性。

香港傳媒教育運動

其實早在回歸之前，不少教育界人士及青少年工作者已經留意到傳媒對年青人的成長及價值觀的塑造，有很大影響力，並個別開展了一些活動，開始默默耕耘。例如電視意識醒覺協會及影響行動中心，在1980及1990年代向青少年介紹傳媒的影響（黃國富，個人訪談，2001）。與此同時，一群傳媒教育的倡議者把外國推行傳媒教育的經驗引進香港，讓傳媒教育在香港落地生根。回歸後公共空間的破損引起社會對傳媒的關注，無疑為這門新興的教育項目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並掀起了一場傳媒教育運動。

在2001年進行的調查及兩個階段的深入訪談均顯示，香港的傳媒教育是一個自發性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它由下而上，具有眾多的發展源頭，並呈網絡式的發展，運動的中堅分子是教師和青年工作者(李月蓮，2002)。傳統的社會運動一般由正規及科層式的組織做動員工作；而新社會運動的組織架構大多數比較鬆散、非正式和小規模(Johnston, 1994; Klandermans & Tarrow, 1998)，強調非正規的網絡連繫及草根式的參與。而香港傳媒教育就是以網絡模式開展。

2001年的調查發現，當時在香港參與傳媒教育的機構合共超過182間，資料反映香港傳媒教育網絡覆蓋的範圍廣泛，網點密集。鋪結這張網絡的組織及個人，來自不同的領域，包括宗教、教育、社會福利、青年事務、傳媒、家庭事務等界別。有些機構資源比較多或傳媒教育的經驗比較豐富，可歸為「大網點」，充當網絡樞紐的角色。它們是網絡上的核心組織及中堅分子，不僅大力推動傳媒教育，還向其他「小網點」作出支援。這些樞紐如突破機構、香港傳媒教育協會、明光社、香港教育城、香港電台、靈風中學等。至於網絡中的小網點，則是個別的學校、小機構及個別的老師。

社會參與模式的實踐

調查資料又顯示，香港傳媒教育無論是主辦機構的性質、推行方式和活動內容都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有的在課堂進行，有的是課外活動。不過，它們推行傳媒教育的目標及實踐傳媒教育的取向，是異中有同。本文集中研究傳媒教育網絡中的樞紐組織，分析它們的傳媒教育工作，以審視「社會參與模式」概念在香港落實的情況。分析的架構包括幾個部分：一、那些樞紐組織的傳媒教育目標；二、它們對傳媒環境及公共空間的回應；三、培養傳媒素養(認識、分析、善用及監察傳媒)的實踐情況。

傳媒教育目標

香港的傳媒教育樞紐組織背景各異，但這個研究發現它們的目標其

實相當一致，就是以年青人為培訓對象，提高他們的傳媒素養。它們要協助學生發展批判思維，建構獨立的價值觀和學習成為懂得發聲的公民。

以靈風中學為首的九間中學編製的《跨進新紀元：傳媒教育》的中學教科書，列出四大目標：發展學生的傳媒素養、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技能、培養學生建構價值觀的能力、促進主動並具識見的公民 (informed citizen) 質素 (羅瑞蘭，1999)。靈風中學是推行傳媒教育的先鋒學校，它是發展初期一個重要的樞紐。它倡議的教學目標，在學界有領導作用。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認同培養具備傳媒素養的香港公民是重要的。它積極遊說政府將傳媒教育列入學校課程，認為這樣可以令每一位年青的下一代有機會接受傳媒素養訓練。它曾向港府提交建議書，要求把傳媒教育列為通識教育科 (Liberal Studies) 的必修單元，並強調傳媒教育在社會層面可以作出的貢獻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2005, p. 3)：

傳媒教育可以幫助培育有知識及有責任心的公民，如果香港市民具備傳媒素養，他們可以監察傳媒機構，要求它們改革。如果我們有健康的傳媒體制及傳媒環境，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更好的社會。

雖然最終傳媒教育未能成為中學通識教育課程中的必修項目，但成了其中一個選修單元，傳媒被列為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的一個課題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香港傳媒教育協會運用這個新課程契機，繼續推廣公民培訓。

專注青少年服務的突破機構，著意培養廿一世紀的傑出青年領袖和公民，對它來說，「傳媒教育是促進同學對於傳媒的批判力，從而檢討和善用傳媒，藉傳媒發表己見，參與社會的公眾空間。」(梁永泰，個人訪談，2000；梁永泰，2002：8)。另一樞紐機構明光社比較重視社會監察，它特別關心傳媒不良資訊對兒童及年青人的影響。該社出版的中學生傳媒手冊指出，傳媒教育的目的在於訓練人們運用批判思維來分析及接收大眾的訊息，提高自主能力，做一位精明的消費者和高批判能力的「醒目公民」(莊婉芬，2004)。

教育網站「香港教育城」不強調監察，但同樣重視培養勇於批判的媒體公民。它設有傳媒學園和「媒體公民天地」(Media Education i-World)，舉辦全港專題錄像比賽，口號是「變身媒體公民，打造香港文化」(香港教育城，2007)。傳媒教育方針是教導年青人投身傳媒製作，進行社會專題探討，在過程中學習解決問題及評論，釋放創意，表達自己的聲音(黃穎詩，2003)。鼓勵年青人發聲的另一個機構是香港電台，它的「點指傳媒」(Point@Media)傳媒教育網站，除了透過介紹傳媒條例、媒體運作及傳媒文化以啟發年青人如何判斷及接收正面的傳媒資訊外，還鼓勵年青人「自己做傳媒、自己發聲，講出我思我想」(點指傳媒，2007)。從香港傳媒教育網絡中各個樞紐組織的目標，可見它們推行的傳媒教育，十分重視「公民」的培育。

回應傳媒公共空間

在2007年的傳媒教育調查中，83.5%的受訪教師不同意「我認為香港傳媒環境並沒有受到污染」的說法，而62.6%也不同意「我的同事們覺得香港的傳媒環境十分理想」，可見教育界普遍不滿香港的傳媒環境。

對於九七回歸後的傳媒環境劣質化，很多推行傳媒教育的組織都有強烈回應，明光社是最明顯的例子。該社率先進行報章污染指數的研究，並發表報告指摘一些大眾化報章的煽色腥報道手法。該社的其中一個口號就是「關注傳媒污染、正視社會歪風」(明光社，2007)。

很多從事傳媒教育的老師，也關心香港的傳媒環境。在靈風中學編製的傳媒教育教材套中，有不少章節討論暴力漫畫、報章色情泛濫及傳媒侵犯私隱的問題，並指導學生應如何回應。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也對傳媒公共空間的下滑感到憂慮，它在會章裏提到該協會的其中一項長遠目標是要促進傳媒改革，以改善香港的傳媒及文化環境(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2000)。

香港電台的傳媒教育網站向年青人介紹《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宣傳及教育活動，討論傳媒操守，並指出傳媒資訊有正有負。它又說：「新聞時事，由你話事！」，意思是提醒年青人在良莠不齊的傳媒環境中要保持清醒及自主。香港教育城及突破機構等的傳媒教育活動，並

不強調傳媒環境的好與壞，但鼓勵年青人到公共空間發聲，及引導他們思考甚麼是理想的傳媒節目(莫蔚姿，個人訪談，2000)。

從以上的回應看來，傳媒教育樞紐組織的傳媒教育課程及活動，相當積極回應九七後的傳媒環境，但是似乎側重了一些由市場導向新聞及傳媒商品化引發的問題，對於公共空間言論的收窄等政治議題，少有探究，本文稍後會再詳述這個情況。

培養傳媒素養

在社會參與模式概念下的傳媒教育，在實踐方面要培養四方面的傳媒素養：認識、分析、善用及監察傳媒。以下透過分析那些組織怎樣培訓傳媒素養，探討在香港栽培具批判能力的公民，遇到甚麼挑戰。

從傳媒教育調查可見，傳媒教育活動一般都涉及認識及分析傳媒。自1997年以來，在傳媒教育網絡中，各個樞紐組織都舉辦了許多師訓課程和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進行了多次調查，出版了很多教材套，撰寫了大量文章及舉辦了很多活動去宣傳傳媒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下來，傳媒教育的學員基本上增進了不少有關媒體的知識，對傳媒的影響力也有所警醒。

學習分析及批判傳媒是傳媒教育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如果學生能掌握批判思考能力，他們就可以找出傳媒背後隱藏的價值觀，能識辨資訊的好壞及對錯，懂得評賞傳媒的表現。在香港，不同的機構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傳媒批判訓練。有些採取直接灌輸法，例如教授解構廣告的方法，了解廣告信息背後鼓吹的消費主義。有些以媒體製作為切入點，先讓學生投身媒體創作，讓他們在實踐中學習表達，然後再對自己的製作成果進行反思，了解傳媒的建構過程及價值觀的滲透，從而學會評論及批判思維(陳智達，個人訪談，2007)。

香港的傳媒教育在培訓批判思考方法究竟有沒有成效？靈風中學的個案研究發現，43.3%的學生認為課程可以幫助他們培養批判思維，只有14.7%的人表示不同意(Lee & Mok, 2003)。而「香港傳媒評論年」的個案研究也顯示，85%的參加者認為學習傳媒評論對他們個人有好處，可以培養批判思考能力(Lee & Mok, 2005)。由於以上這些調查只反映參加

者的主觀意見，大家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思考能力實際上有沒有提升，突破機構的研究部門又設計了「傳媒及資訊素養標尺」(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cales)，運用很多問題去考核學生，測量他們的傳媒及資訊素養水平。「傳媒及資訊意識教育計劃」個案研究對這批數據進行了分析(Lee & Mok, 2003)，發現當學生參加了一個傳媒教育工作坊(例如新聞營會)之後，他們對那個課題(例如新聞)的批判思考能力有提高，但他們無法將從一特定課題學來的批判思考能力，轉化運用到另一些課題(例如電視劇)上。換言之，他們無法舉一反三和觸類旁通。他們從傳媒教育課程裏只培養到「淺批判思考能力」(shallow critical thinking skill)，但傳媒及資訊素養標尺的水平則沒有提高，即課程未能培養深化的批判思考能力(sophisticat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相信是香港的傳媒教育課程及活動絕大部分是「斬件式」(piecemeal program)的。香港的傳媒教育並不是學校裏的正規課程，只是有些熱心的老師零星地把它引入自己所教的科目裏，而其他機構也是非經常性地舉辦傳媒教育活動。而斬件式或偶然一次的傳媒教育，對培訓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成效有限。成熟的批判思考能力不可以一蹴即至，需要長期、持續及有系統的培訓。這是體制的問題，並非改善教學方式就能改善。所以實在有需要爭取將傳媒教育列為學校正規課程一部分，讓學生能夠有系統地學習。以現時情況看來，雖然香港的傳媒教育未能訓練深化的批判思考能力，但對提升一般的「淺批判思考能力」依然是有幫助的。

再看2005年的傳媒教育調查，87.9%的受訪教師同意傳媒教育幫助學生認識傳媒的功能及運作，87%同意傳媒教育能讓學生學懂分析傳媒訊息及其價值觀。更有74.1%的教師，同意傳媒教育能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這些數據反映，教育界大致上對傳媒教育有信心，認為它可以培育具備批判思考能力的新一代。

那麼，香港的傳媒教育能否培養年青人積極參與社會的公民意識？首先看一些傳媒教育樞紐機構如何引導學生善用傳媒去表達意見。香港教育城舉辦全港學界專題錄像比賽，鼓勵同學透過錄像創作，進行專題研習，培養學生關注周遭生活和切身議題，並自由表述見解。最近這個教育網站還嘗試製作專題研習作匯輯(Project Wiki)，讓參加專題研習錄

像比賽的學生，介紹自己的作品和製作反思，並與其他人互動分享。突破機構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六百萬港元而舉辦的「傳媒及資訊意識教育計劃」，也設計了網站、營會、校園電台、影像創作比賽等，讓參加的年青人在學習媒體製作之外，還可學習表達自己對生活和社會的感受和意見。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全因為你計劃之全方位兒童傳媒教育活動計劃」及《黃巴士雜誌》的「小學傳媒教育工作坊」，更將「善用媒體自由發聲」這個傳媒教育理念帶到小學生當中。前者出版傳媒教育新聞簡訊，由小學生編寫他們對傳媒現象及社會現象的觀察及評論（黃國富，個人訪談，2007）。後者也打算在所屬雜誌上騰出版面設立「自由講場」，讓兒童也學習對生活及社會表達意見（許芷茵，個人訪談，2007）。

而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和香港教育城更於2002至2005年舉辦了三屆「傳媒評論年」活動，包括了流行音樂、電視、電影及新聞評論學生工作坊，讓學生有機會學習評論傳媒的技巧。而且更舉辦傳媒評論徵文比賽，鼓勵學生在掌握評論技巧後，親身實踐，對香港的傳媒表現作出評論及監察。

鼓勵年青人發聲的傳媒教育課程不少，但鼓吹以行動監察傳媒的活動就其實不多。不過也有熱心的傳媒教育老師，指導他們的學生盡公民義務參與社會。例如佛教何南金中學的教師，就鼓勵學生透過校園電台監察傳媒（梁麗容，個人訪談，2000；趙漢光，個人訪談，2001），而靈風中學曾連繫九間中學的學生一起參與一個聯合傳媒監察計劃，學生基於實際觀察向影視處作出投訴。而倡議監察傳媒最落力的是明光社，該社透過各種傳媒教育活動鼓勵市民以行動監察傳媒，又為市民提供投訴及嘉許傳媒的範文參考，但反應不算熱烈。

勇於發表意見與願意採取實際行動去監察傳媒，可以是兩回事。2003-04年度「傳媒評論年」的個案調查結果顯示，在279位參與同學之中，66%認同評論及監察傳媒是每一位公民的義務，他們認為年青人應該評論傳媒，而且願意學習。可是，當問及日後他們是否樂意對那些高質素或有問題的傳媒節目，公開表達意見和作出評論時，就只有45%的同學表示樂意。縱觀傳媒教育的實踐，表現最好的地方是灌輸傳媒知識及提升了大家對傳媒影響力的警醒，至於訓練批判思維方面，也有頁

獻，但可能局限於培訓「淺批判思考能力」。傳媒教育也有助鼓勵年青人在公共空間發聲，但對於培養他們以行動監察傳媒方面，則力度未足。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界發現傳媒教育與教育改革的精神膾合，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方式，透過九項共通能力(資訊科技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創作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等)的培育，可以讓學生「學會學習」，有助培育廿一世紀知識型人口。所以早在2000年初，教育官員已鼓勵教師在課堂及課外活動加入傳媒教育(Yiu, 2001)。由於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指引，也有提及傳媒教育，所以不少公民教育老師都會在課堂上討論傳媒。香港的公民教育科僅始於1985年，而且一直推行不理想(Cheung & Leung, 1998)，有些學校根本不開設這個課程，所以傳媒教育未能與公民教育科結合，在香港全面培育具批判能力的公民。

非政治化的傳媒教育

香港的傳媒教育在課程內容方面十分多元化，但卻明顯地「非政治化」(apolitical)。課程經常探究消費主義、社會角色定型、傳媒色情和暴力、傳媒商品化等社會及文化議題，但極少論及政治，甚至只有少數傳媒教育工作者會討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這個偏向對培養具批判能力的公民，有一定的制肘。儘管有本地傳媒教育教科書提及，傳媒的訊息有政治含義(羅瑞蘭，1999)，但實際上本地的傳媒教育課程和活動鮮有觸及政治問題。深入訪談的資料顯示，這個現象可從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學校文化及傳媒教育的本質來解釋。

首先，香港是在殖民地統治下成長的城市，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回歸之後，香港人一樣是不能夠參加普選，政治是空談，不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大部分香港人政治冷感。由於香港社會傾向非政治化，政治不是一個特別受歡迎的課題，故此，傳媒教育工作者也少拿政治議題來討論(潘素霞，個人訪談，2007)。雖然近年香港的社會氣氛比以往關注政治，但始終大眾的注意力還是集中於經濟、民生及社會問題多一點，一般香港人還是有興趣談股票多於談政治。

傳媒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年青人，在教育工作者眼中，香港大部分的年青人覺得政治跟自己不相干，他們不關心也不喜歡政治，故此傳媒教

育少以政治為題。年青人被認為喜愛娛樂，有些傳媒教育工作者為了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於是傾向選擇年青人接觸較多的課題如流行音樂、電視劇和廣告，作為教學的切入點(張志儉，個人訪談，2007；莫蔚姿，個人訪談，2007)。究竟年青人是否真的不關心政治？七一遊行的行列中有不少的年青人，有些年青人更充當區議會選舉的助選義工。而在2007年的特首選舉期間，很多年青人網站和討論區例如YouTube和uwants.com等，都有大量梁家傑及曾蔭權的辯論片段及新聞。有學生調查指出，不少中學生到訪梁家傑的網誌，並在互聯網上發表有關特首選舉的意見(Lau, Chan, & Wu, 2007)。不過這個調查同時發現，在眾多網上特首討論中，大部分屬「非議題」，換言之，年青網民追求選舉的花絮及娛樂性多於認識候選人的政綱。儘管年青人對政治問題的關注點不同，但他們不一定對政治完全無興趣，不過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似乎很少嘗試去引導學生討論傳媒訊息的政治含義，這相信與保守的學校文化有關。

香港的學校文化不鼓勵政治討論。在殖民地時代，《教育條例》第98條列明，任何有政治成分的言論、宣傳及活動都不准在學校內進行。所以談論政治在學校是一個禁忌(Cheung & Leung, 1998)，連學校的課程及教科書也迴避政治問題(Morris, 1992)。1997年之後，這條例雖然已經刪除，但那種不論政的風氣依然存在。不少教師指出，很多校長不鼓勵教師在教學中有政治立場，所以教師在不知不覺間會進行「自我審查」，避談政治，免招麻煩。另外，一些學校的辦學團體有特定政治立場，教師也不想討論政治議題時與所屬辦學團體的立場產生矛盾，他們覺得為免引起爭議，最好是少談政治(趙漢光，個人訪談，2007)。曾有一間學校的學生，嘗試在校園電視製作台灣選舉專題，但被負責老師遊說，改了題目，這反映一些老師對政治議題的確過度敏感(朱順慈，個人訪談，2007)。

一些推動傳媒教育的人士及組織指出，很多時他們會刻意迴避政治，因為恐怕討論政治問題時會表露了自己的立場，造成政見分歧，不利傳媒教育在學校開展。例如討論《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及六四事件，可能會透露了講者贊成與反對的立場，有些學校的校方不喜歡他們的課堂或活動牽涉這些政治爭議(蔡志森，個人訪談，2007)。其實教育本身就

「非政治化」，因為有了立場可能妨礙學術自由探討。而且香港政黨力量太弱，它們的政治思潮未能滲透入學校，發揮影響力(黃志堅，個人訪談，2007)。不少傳媒工作者又認為，傳媒教育培養同學的批判思考技能，只要他們掌握了這種能力，就可以運用來分析政治問題，故此無必要一定在傳媒教育活動中談政治(陳智達，個人訪談，2007)。

第三，傳媒教育的本質是新社會運動，而新社會運動進行的場地是民間社會，它比較側重社會和文化議題。而且傳媒教育的倡議者是教師和社工，這群專業人士一般政治中立(馮偉光，個人訪談，2007)。既然從事的人不政治化，他們的教學取向自然也傾向「非政治化」(朱順慈，個人訪談，2007)。再者，香港的教師本身是殖民地教育的產物，不習慣討論政治。當然也有例外，在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就有老師帶領學生去參加，更有老師在課堂裏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但這類老師仍屬少數。有校長指出，談論傳媒道德，老師可以憑人生經驗去分析，但談論政治，卻需要識見。很多香港教師以往沒有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又未必主動進修政治，所以他們不僅不關心政治，而且不懂政治和缺乏信心教授政治，故此在傳媒教育的課堂自然很少探討政治議題(歐陽崇勳，個人訪談，2007)。

總結

威廉斯(Williams, 1961)在《長征》一書裏提出現代社會要長期進行三方面的革命去改善人類福祉，這三方面是民主革命、工業革命及文化革命。三項革命互動發展，令人類社會更民主、富庶及文明，而傳媒體制改革正是文化革命重要的一環。「社會參與模式」的傳媒教育理念是想促進文化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良性互動關係，希望在香港培育傳媒素養高的市民，讓他們成為具批判能力的公民，協助改善傳媒體制和振興公共空間，建設民主社會。

這個研究發現，傳媒教育在培育具批判能力的公民無疑有一定的貢獻。回歸十年，傳媒教育學員對傳媒力量的警醒性提高，批判思考能力提升，更勇於學習發表意見。傳媒教育網絡的樞紐組織，對香港的傳媒環境也積極回應。它們有的企圖遏止傳媒環境繼續惡化，有的鼓勵年青

人到公共空間發聲，促進正面參與。不過，社會參與模式在推行上也有不足之處，出現了理想及實踐之間的落差。

首先，香港傳媒教育在培訓市民以行動參與傳媒監察及改善公共空間方面，明顯不足。其次，傳媒教育在推行上也遇到另一項重大挑戰，那就是社會環境及學校文化的政治冷漠，令傳媒教育變得「非政治化」，使它只關顧到社會文化問題，忽略了政治議題的探討。雖然有教育工作者提出，學生可自行運用從傳媒教育科上學到的批判思考來分析媒體政治，但上文也提到，目前「斬件式」的傳媒教育難以培訓「深化批判思考技能」，年青人未必能把學到的個別傳媒批判技巧，用來分析他們陌生的政治議題。這些缺點，令傳媒教育在培養兼具批判能力和社會參與意識的公民上有所局限，也未能全方位協助振興公共空間。

香港社會及學校的「非政治化」的風氣，不僅對傳媒教育的發展不利，其實一直以來，對整體教育、政制和傳媒的發展都有牽絆。香港人政治冷感，令選舉文化不容易紮根，令新聞報道娛樂化及瑣碎化更嚴重，令學習到處設禁區，就連國民身份認同也繼續模糊不清。

不過，近年香港的政治環境起了變化，自2003年七一遊行以來，香港人對政治逐漸多了關懷。此外，教育改革及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立又為傳媒教育注入新的動力。通識教育的其中一項宗旨是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2）。傳媒教育日後和通識教育課程加緊配合，相信對實現社會參與模式的理想，會帶來新的突破。

參考文獻

李月蓮 (2002)。〈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網絡模式」的新社會運動〉。《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07-131。

明光社 (2007)。〈本社資訊〉。上網日期：2007年6月6日，取自明光社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index.jsp>。

香港教育城 (2007)。〈第四屆全港專題錄像比賽〉。上網日期：2007年6月8日，取自香港教育城網站，<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project/campustv4/main.php>。

莊婉芬 (2004)。《傳媒哈哈鏡：中學生傳媒教育手冊》。香港：明光社。

- 梁永泰(2002)。〈傳媒教育在教育改革中的角色〉。《突破傳媒教育教材套II》。香港：突破出版社。
- 黃穎詩(2003)。〈善用創意媒體推行民主教育〉。上網日期：2007年6月8日，取自香港教育城網站，http://hkedcity.net/article/culture_artedu/030506-003。
-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年3月27日)。《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網頁，<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5962&langno=2>。
- 點指傳媒(2007)。〈關於我們〉。上網日期：2007年6月6日，取自eTVonline網，http://mediaed.etvonline.tv/mediaed_aboutus.html。
- 羅瑞蘭編(1999)。《跨進新紀元：傳媒教育》。香港：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 AC Nielsen (2001, November). *2001 ACNielsen HK: The millennium study – Media index summary report*.
- Arvidson, C. (2000, December 1). *Ousted Hong Kong editor sees signs of intimidation by China*. The Freedom Forum Online, Asian section. Retrieved January 9, 2001, from www.freedomforum.org.
- Boyd-Barrett, O. (1995) Conceptu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O. Boyd-Barrett &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A reader* (pp. 230–234). London: Arnold.
- Buckingham, D. (2000). *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Buckingham, D. (2003).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Cheung, C. K., & Leung, M. (1998). From civic education to general stud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imary curriculum. *Compare*, 28(1), 47–56.
- Court, S., & Criticos, C. (1998). Media education in an emergent democracy: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In A. Hart (Ed.), *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79–10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Dahlgren, P. (1991) Introduction. In P. Dahlgren & C. Sparks (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 (pp. 1–24). London: Routledge.
- Dahlgren, P. (1995)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 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abermas, J. (1989)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2000). *The 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Association Document.
-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2005, January). *A response to the reform proposal on secondary education*. Brief submitted to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1999). The ground rules chang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two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to China. *1999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 Johnston, H.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old regional nationalism. In E. Laran, H. Johnson, & J. Gusfield (Eds.),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p. 3–35).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landermans, B., & Tarrow, S. (1998). 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 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In B. Klandermans, H. Kriesi, & S.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pp. 1–37). London: JAI Press Inc.
- Lau, K. S., Chan P. F. & Wu, H. T. (2007). *Election and media: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Lee, A. Y. L. (1996). Media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and their curriculum implications for media edu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25(3), 209–234.
- Lee, A. Y. L. (2000a, May). *Media education, critical citizenship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social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media educ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ummit 2000 Conference, Toronto, Canada.
- Lee, A. Y. L. (2000b, January). Media's freedom and laissez-faire under marketization. *Horizon*, 4–7.
- Lee, A. Y. L., & Mok, E. (2003, May). *Cultivating critical young mind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Case studies of media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USA.
- Lee, A. Y. L., & Mok, E. (2005, May). *Media education and the nurturing of young active learner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the Instructional & Development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 New York.
- Leung, Y. M. (2000, January). Culture industry and consumerism. *Horizon*, 8–11.
- Masterman, L. (1985). *Teaching the media*. London: Comedia Publishing Group.
-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177–187.
- Morris, P. (1992).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Hong Ko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P. Morris (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chwoch, J., White, M., & Reilly, S. (1992). *Media knowledge: Readings in popular culture, pedagogy, and critical citizenship*.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o, C. Y. K. (1997). Complete market-oriented journalism: The case of *Apple Daily*. In J. M. Chan, L. L. Chu, & Z. Pan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pp. 215–233). Hong Kong: Lu Feng Society.
- So, C. Y. K., & Chan, J. M. (2007).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48–158.
- So, C. Y. K., & Lee, A. Y. L. (2006, June). *Radio phone-in talk shows as people's counc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Division, Dresden, Germany.
- Tao, D. F. (2000). *Postcolonialism*. Taipei: Yang-Chih Book Co.
- Vines, S. (1999). *Hong Kong: China's new colony*. London: Orion Business Books.
-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 Williams, R. (1962). *Communications*.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 Wong, R. R. (1999, January). *Credibility crisis: What's wrong with journalism and how to fix i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Reforming the News Media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Yiu, M. T. (2001, December). *Media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Seminar of Bringing Media into the Classroom, Hong Kong.

附錄一：訪問名單

2007年訪問名單：

- 朱順慈，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通識教育主任，9/5/2007
- 莫蔚姿，前突破機構文化樓經理，8/5/2007
- 陳智達，香港教育城計劃經理，12/5/2007
- 許芷茵，《黃巴士》雜誌，12/5/2007
- 黃志堅，教育統籌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8/5/2007
- 黃國富，基督教服務處企業事務與社區關係部傳媒教育幹事，11/5/2007
- 馮偉光，《蘋果日報》主筆，10/5/2007
- 趙漢光，佛教何南金中學，9/5/2007
- 潘素霞，香港教育城計劃經理，12/5/2007
- 蔡志森，明光社總幹事，8/5/2007
- 歐陽崇勳，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校長，9/5/2007

2000–2001年訪問名單：

- 伍偉賢，香港電台成人教育組編導，23/7/2001
-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香港電台「傳媒萬歲」節目策劃，25/2/2000及15/9/2001
- 何秀蘭，立法局議員，25/2/2000
- 孫耀輝，突破機構文化樓程序主任，19/6/2001

- 梁永泰，突破機構執行副總幹事，23/2/2000及16/6/2001
- 梁麗容，佛教何南金中學老師，25/2/2000
- 梁旭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4/7/2001
- 梁瑞琮，教育署課程發展處首席課程主任，15/4/2000
- 翁偉微，香港電台電視部策劃編導，11/5/2001
- 莫漢輝，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總監，16/6/2001
- 莫蔚姿，突破機構文化樓經理，24/2/2000及4/7/2001
- 陳春明，香港基督教信義會心誠中學老師，12/9/2001
- 黃國富，基督教服務處企業事務與社區關係部傳媒教育幹事，19/6/2001
- 張少馨，香港電台電視部監製，25/5/2001
- 張志儉，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課程學系助理教授，
24/2/2000及16/6/2001
- 張愛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助理部門幹事，25/2/2000
- 趙漢光，佛教何南金中學，25/2/2000及3/5/2001
- 蔡志森，明光社總幹事，16/6/2001
- 羅瑞蘭，中華基督教會靈風中學老師，7/3/2000
- 錢羣英，香港真光書院老師，31/1/2001
- 謝瑞芳，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16/8/2001